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2.04.016

罗亦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探析

吴志平¹, 向金香²

(1. 中共株洲市委党史研究室, 湖南 株洲 412007; 2.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 从而正确把握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方向。罗亦农是较早重视农民问题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 他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对农民问题进行了探索, 最终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农民问题的独特思考和认识。罗亦农对农民问题的探索与实践, 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启示我们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重视农村文化建设, 促进农村文化振兴,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 保障和改善民生。

关键词: 罗亦农; 农民问题; 土地革命;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K26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2)04-0121-08

引用格式: 吴志平, 向金香. 罗亦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探析[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7(4): 121-128.

Luo Yinong's Thought and Practice on Farmer Issues

WU Zhiping, XIANG Jinxiang

(1. Party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of Zhu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uzhou 412007, China; 2. 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 core issu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was the farmer issue.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ccurately caught this basic issu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orrectly recogniz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s prospect and direction. As one of the early leaders of the CPC who paid attention to the farmer issues earlier, Luo Yinong explored the farmer issu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finally came up with a series of distinctive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about farmer issues. Luo Yinong's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farmer issues are still of great value for the times today. It enlightens us that i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we must adhere to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develop rur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We also should promote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adhere to the supremacy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as well as ensure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Keywords: Luo Yinong; farmer issues; land revolu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罗亦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同时也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他先后在地方和中央担任过重要职务, 一生都在为中国革命而奋斗。学术界不乏对罗亦农

收稿日期: 2022-04-19

作者简介: 吴志平(1964—), 男, 湖南蓝山人, 中共株洲市委党史研究室二级调研员, 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
向金香(2000—), 女, 湖南邵阳人, 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研究成果,但主要集中于罗亦农党建思想方面,而对他关于农民问题的研究,相对而言比较薄弱,且大多数研究是侧重于理论层面的研究,对实践层面的研究有待深入。实际上,罗亦农是党内较早重视农民问题、农民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对农民问题进行了诸多探索,其探索对我党寻找正确的革命道路以及土地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对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亦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罗亦农对农民问题的理论探索

农民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并未受到充分重视,当时,党内大部分同志的工作重心还是放在城市工人运动中。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罗亦农,在关注工人运动的同时,也较早地对农民问题进行了思考。他在中共上海区委特别扩大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就特地提出“农民问题——两年前大家不注意,去年十月新注意到”^[1]。这里的“去年十月”是指1925年10月。可见,他较早就对农民问题展开了思考,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认为农民阶级体量大且革命意志强烈

毋庸讳言,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阶级人口一直占全国总人口的大多数,但近代以来的所有救亡图存的革命几乎都没有重视农民阶级以及他们的利益,致使这些革命因为没有获得广大农民阶级的支持与拥护而进入到“孤鸿哀鸣”的境地,最后以失败告终。罗亦农早在1923年就认识到农民阶级体量庞大的特征,他出席旅莫支部临时大会时,就建议将“《草案》内之‘工人运动’改为‘工农运动’”,因为“中国农民最多,这样比较确切”^{[2]407}。

中国农民阶级之所以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主要是因为这一阶级一直处于社会的底层,近代以来受到了严重剥削和压迫,所以他们具有了强烈的革命意志。罗亦农在他所撰写的《“五一”纪念与农民》一文中,对农民阶级是否备受压迫做出了回答:“谁也知道农民——尤其是贫苦的农民——所受的压迫,比一切人都大。”^{[2]46}正是这些严重的剥削压迫,使得他们从内心深处迸发出以革命斗争结束自身的苦难的想法,因而拥有了强烈的革命意志。并且,农民阶级还把这一革命

意志付诸到实践中,“素无阶级觉悟、无团结的中国农民群众,居然有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出现。”^{[2]50}同时,罗亦农还进一步指出,农民阶级的革命性会愈来愈强。因为,随着战争的持续扩大,国内经济的各方面都会受到打击,工商业势必会停顿甚至破产,乡村也会进一步衰败,这又会使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加大对贫苦百姓的压榨,而依此趋势发展下去的结果自然就是,农民阶级的革命性会变得更加强烈。农民阶级体量大且具有强烈的革命意志,使得农民阶级能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巨大力量。

(二) 提出解决农民问题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罗亦农在长期革命实践过程中认识到农民阶级具有二重性的特征,并对国民党在革命中的作用进行探索,进而得出解决农民问题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结论。罗亦农指出,农民阶级具有革命的一面,因为他们深受剥削压迫、命运悲惨,但又热切期盼获得幸福生活,因此有着强烈的革命热情。同时,农民阶级自身也存在不足之处,即由于长时间受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影响,农民阶级成为了中国最保守的阶级。另外,大部分农民都未受过教育,文化水平较低,很难快速接受新思想。行动上,农民也由于思想上的保守,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罗亦农也看到中国资产阶级的内在本质,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都是反革命的”^{[2]31},代表中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其最终的结果就是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甚至变成帝国主义制造中国内乱的工具。因此,国民党与农民阶级利益是对立的,其不会去解决农民问题。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考察工人阶级劳动与生存状况的过程中,发现了工人阶级作为变革社会的历史主体所背负的伟大使命^[3]一样,罗亦农也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的不同。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具有快速接受新思想、把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继而提出新观点的能力,并且他们还拥有彻底的革命性,所以无产阶级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亦能够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因此,最终指引解决农民问题的使命要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农民想要翻身解放,摆脱桎梏“就只有很亲切地与最革命

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站在无产阶级的指挥之下, 以扑灭他们共同的敌人”^[4]。在 1925 年 1 月主持中共旅莫支部第九次大会, 讨论政治报告时, 罗亦农指出: “殖民地的国民革命非无产阶级去指导不可。”^{[2]31} 所以,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承担起革命领导者的角色, 去积极指引社会解决农民问题, 帮助农民阶级翻身解放。

(三) 分析工农联盟的理论渊源与现实需要

工农联盟是指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为实现一定的战略目标, 在共同利益的前提下, 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结成的政治联盟^[5]。罗亦农从理论渊源以及现实需要两方面进行分析, 发现了进行工农联盟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 在理论渊源方面, 他指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工农联盟都是持积极赞同的态度。“马克思在一千八百三十七年起草《德国共产党应有的要求条件》里面曾经说: 德国无产阶级为本阶级的阶级利益起见, 必须与小资产阶级、农民联合……昂格思[恩格斯]在他著的《德国农民战争》一书里面也曾说: 德国无产阶级的人数既然还没有占全人口的多数, 很显明的, 他要实行革命必须在小资产阶级中、在所谓城市的游民无产阶级中、在农民中去找同盟者……因此列宁提出工农民主革命专政的口号。”^{[2]52} 革命导师对工农联盟的看法, 从理论上提高了他对工农联盟的重视程度, 使他坚信工农联盟是实现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和维系胜利果实的重要保障。

第二, 通过对现实因素进行分析, 他发现, 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在革命中存在着联盟的基础。一方面, 无产阶级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经济上就是要废除延续上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解决农民阶级的土地问题; 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农民阶级最迫切的需求就是自己拥有土地。另一方面, 在政治上, 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 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面对着共同的敌人——资本的压迫和剥削, 二者都有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统治, 建立人民政权的政治意愿。由此可见, 农民阶级与无产阶级在根本利益上存在着共性, 农民阶级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罗亦农认为, 农民阶级渴望得到土地。他在《中国工人》一文中指出: “姑无论中国农民是否被压迫和被剥削者在大多数, 而这部分或最大部分的农民最后希望, 总不

外是: ‘土地归农民’。”^{[2]47} 他也认同奥斯脱洛夫斯基的观点, 即“中国被压迫的工人、农民、青年军人……我们要共同的打倒资本制度”^{[2]51}。他还仔细研究俄罗斯的发展历程, 他发现, 要使农民阶级真正地获得土地, 翻身成为主人, 其前提是要先赢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所以, 他提出, 中国农民阶级要想获得土地并解放自身, 必须与无产阶级进行联盟, 共同去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可见, 他在革命早期就发现了农民阶级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同盟军的潜质, 认识到了工农联盟的必然性。

(四) 提出差异化进行工农联盟

罗亦农对工农联盟一直持支持态度, 认为工农联盟是革命成功的重要保障, 他曾经这样说过: “工农兵三种被压迫的群众, 同在一起向帝国主义、军阀、资本家游行示威, 不仅在中国革命运动史上有更大深远的历史意义, 而且是中国目前革命运动积极爆发的表征和中国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谋达到自己完全解放, 实行大团结的征兆。”^[6] 在主张实行工农联盟的同时, 他还注意到农民阶级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阶级, 这个阶级的内部存在不同类型的成员, 因此, 需要差异化地进行工农联盟。罗亦农从经济地位角度把农民阶级分为三类: 其一是地主, “地主则居于压迫和剥削的地位”^{[2]47}; 其二是佃农和贫农, 他们是被剥削被压迫的一群人; 其三是雇农, 他们属于被压迫和剥削得一无所有, 只能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一群人, 可以说他们就是农民中的无产阶级。不同地位的农民阶级, 他们所具有的革命性是不同的。所受压迫和剥削程度越强的农民, 其革命性就越坚定, 所以对农民要进行有区别、差异化的联盟。罗亦农在《目前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一文中特别强调要重视贫农, 呼吁“中国革命, 只有无产阶级和贫农才能担负, 必须坚决行动才能引起他们的革命狂潮, 这一点的关系非常巨大”^{[2]353}。

(五) 萌生早期工农武装割据思想

第一, 注重开展土地革命。马克思提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 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市民社会”主要指现实的经济生活, 封建社会的经济生活基础是封建土地私有制, 所以我党要先推翻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 才能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因此, 罗亦农提出以土地革命的方

式来推翻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新的政治制度。1927年在担任湖北省书记时,罗亦农就主张“现已成立特委的为鄂南、鄂西、鄂中、襄枣四区,主要的工作是土地革命,实行杀土豪劣绅、抗租抗税、没收地主土地等工作”^{[2]321}。由此可以看出,自大革命失败之后,罗亦农就逐步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农村,转移到了农民阶级身上。他注重进行土地革命,以推翻封建土地私有制,加快新的政治制度建设。

第二,明确游击战争在农民运动中的重要性。1926年,罗亦农对各个地方同志提出要求,在进行革命的各项工作时,须包含农民运动。在召开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时,他也提到,要加强做农民运动的力度,并且要通过出版报纸的方式进行宣传。在北伐战争失败后,罗亦农关于农民运动的思想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提出,在发展农民运动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三点。其一,要重视党的领导在农民运动中的重要性。罗亦农在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党的策略应当是发展游击战争》中指出,江西农民运动的工作并没有达到原本的期望,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江西省委没有重视党的领导在农民运动中的重要性,他们离农民运动的中心太远了,不利于对农民运动工作的指导。所以,罗亦农提出要江西省委的办公地点要搬至农民运动的中心区域,以加强党的领导。其二,要重视游击战争。湖南湖北以及广东的革命暴动失败以后,罗亦农安慰同志们不要因为暂时的失败而丧失继续革命并最终取得胜利的信心。他说,现阶段革命仍会猛烈地向前发展,并提出“农民运动目前应扩大游击战争,杀尽豪绅地主,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和一切公地,分配土地,一乡一县的弄起来”^{[2]358}的要求,以期增强大家对游击战争的重视。其三,相信群众的力量。罗亦农指出,我们的同志还存在一种错误倾向,即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在他所作《中共湖北省委政治报告》中,他描述了党内部分同志轻视群众力量的现象。当时,负责鄂南工作的同志对罗亦农进行提问:当鄂南地区出现暴动时,我们武汉的军队力量能否提供支持。他认为,这些同志开展暴动时主要想运用的是军队力量,而非利用群众力量,这对于开展农民运动是不利的。他极力纠正了这种做法。为此,他在《中共湖北省委政

治报告》中着力阐明了群众力量对于农民运动以及整个革命运动的重要性。

第三,重视建立农民革命的根据地、农村政权。农民革命的根据地与土地革命、农民运动是相辅相成的有机统一体,罗亦农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不断发展农民革命的根据地将大大助力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的发展:“但在可以攻城或可以占据数县的地方,省委应当坚决的领导这许多农民攻城或占据某几县为农民革命的根据地,以发展各地的运动。”^{[2]333}他提出,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发展同样会助力农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他称赞当时湖北多地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进行得非常好,并要求之后应该继续加强这两方面的工作,以创造出一独立割据的局面,形成一系列农民革命的根据地。同时,罗亦农也看到了建立农村政权的重要性。他指出,如果在暴动的过程中能够产生一些工农联盟的新的政权形式,为实现武装斗争和建立政权奠定坚实的基础,那么革命的前途将很乐观。

罗亦农提出,中国革命应以农村为中心,重视土地革命、游击战争,重视建立农民革命根据地与农村政权,努力争取开创一独立的割据局面。他的这些认识与毛泽东所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可谓不谋而合。

二、罗亦农对农民问题的具体实践

(一)组织农村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农民阶级政治觉悟

农民阶级深受压迫,因而革命意识强烈,但这一群体仍然有保守消极的一面。首先是农民阶级对于革命的对象了解不够,政治觉悟不高。对此,罗亦农在《“五一”纪念与农民》一文里有具体表述:“最使他们看不清楚而又是他们一切痛苦之根源的,还是帝国主义的间接压迫呀。”^{[2]46}其次是在当时环境下,农民阶级身上所激发出的少量革命意识,没有集中转化到行动上来,其主要原因是农民阶级缺少转化方法和先进思想引导。罗亦农在1927年9月10日中共中央常委会上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并不是农民不愿杀土劣愿交租,而是农民意识尚未总会[汇]起来集中到行动上走[去],而是我们未领导他们,这是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2]324}

罗亦农在明确农民阶级的局限后, 提出了对农民阶级进行教育改造的两条建议。

第一, 派同志至乡村进行教育工作, 唤醒农民阶级的政治意识。罗亦农提出, 要针对农民阶级的不足进行相应的教育。他在 1926 年 11 月向区委全体会议作政治报告时指出: “区委正式组农民运动委员会, 做减租运动, 先办训练班。”^{[2]459} 在 1927 年 2 月举行的上海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 罗亦农作为农民问题委员会主任, 提出了进行农民运动工作的要点: “对于农民要行初浅的教育, 不要奢望。对农民党员要做识字运动。农村支部、独支地方书记要特别施以教育。”^{[2]237} 这些指示迅速在全党发布, 得到推广执行。1927 年 12 月, 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里, 还特意提到了具体的教育内容, 比如“在九月十日举行总暴动之前, 党与农民协会又开群众大会或代表大会(根据符向一同志报告), 如此工作方法, 何得谓非以党的组织去发展与领导争斗? 各农民争斗的区, 省委均组织特别委员会, 又是什么意思?”^{[2]396} 等。他认为, 通过这些教育工作, 既可以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 为发动农民参与革命做好准备, 还可以提升农民阶级的文化知识水平与理解能力, 使我党的政治宣传效果实现最大化, 提高我们党在农民阶级中的信任度以及影响力。同时, 还可以使农民阶级明白革命的对象是谁, 认识自身力量的强大, 进而唤起农民阶级开展农民运动、参加革命斗争的政治意识。

第二, 对农民阶级进行政治宣传, 加强思想和行动上的引导。罗亦农在《湖南紧急会议决议案(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中提到湖南地区下阶段的工作计划, 其中特别强调, 在敌人日益狡猾的政治宣传下, “本党若不再加紧政治的鼓动与宣传, 回答敌人, 指明工农群众以争斗的方法与出路, 将要在政治上失掉一切革命的群众”^[7]。所以我们党需要进一步加强政治宣传。其实, “政治宣传”并不是我们中国本土的词汇, 而是一个“舶来品”。政治宣传的概念第一次被提到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一文里, 在这篇文章中出现了“宣传工作”的概念, 并对无产阶级党员提出了要求: “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8]。罗亦农继承并践行这一要求。在 1927 年 9 月, 他在给武汉三镇的工作指示中就

提到要努力做好政治宣传工作, 并具体明确了两个方向: “1. 宣传农村的暴动; 2. 用简单事实(如说: 如果汉宁妥协成功了, 为什么政府各机关都迁往南京, 而独军事委员会不迁呢? 可见仍是军阀的冲突)证明汉宁妥协之不会成功。”^{[2]326-327} 第一点是提高并发展群众的斗争情绪, 第二点是必须打破群众的一切幻想, 使我党政治宣传工作效果最大化。1927 年 10 月, 长江局正式成立, 罗亦农担任长江局书记。他根据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指示以及长江局所辖七省的实际情况, 对后期工作做了具体安排。他在《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中提出要求: “在这宣传周中各委均宜用本党某省委名义发表宣言, 这一宣言必须罗举新旧军阀统治下工农群众被压迫的事实。”^{[2]365} 他认为, 通过加强政治宣传, 能够调动农民阶级的革命情绪, 提高其政治觉悟, 使农民阶级自觉自愿地跟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促进政府各级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

(二) 发展工农联盟, 增强革命群众力量

罗亦农认为, 进一步开展工农联盟工作, 必须做好以下两点: 第一, 要利用好特殊时机, 即抓住敌人虚弱或敌人矛盾激化致使敌人政权不稳的时机。原因在于, 敌人在政权不稳的情况下, 会急于休养生息以增强自己实力或者忙于巩固自己的政权, 这时的敌人将无暇顾及中国共产党是否在进行工农联盟活动。1927 年 10 月, 安徽省委向他寻求下一步工作指示, 他立即回复了一封指示信。信中分析了宁汉战争爆发后安徽的形势, 指出唐系军阀在面对其他敌对力量时, 无论是选择放弃斗争, 从而被敌对力量打败, 还是选择为了保持已有的状态, 去耗费物力人力与敌对力量进行斗争, 唐系军阀都不可能再保持住目前稳定的优势了。所以, 他在指示信中要求安徽省委即刻执行“利用军队移动或开拔的机会及敌人政权动摇或空虚的地方领导农民”^{[2]345} 的指示, 以加强工农联盟, 发展更大规模的农民群众暴动。第二, 要通过满足农民阶级最迫切的需要来加强工农联盟。他提出, 加强工农联盟要从农民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策略, 以此来满足不同地区农民阶级的不同需求, 这样才有利于农民阶级坚定服从工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巩固和加强联盟。鄂

南暴动失败后,他提出,要进一步加强鄂南地区的工农联盟。为此,他对鄂南地区农民阶级的需求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鄂南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鄂南农民已经表现出普遍的热烈的想要参加暴动的意愿,但许多负责暴动的同志却不相信农民有如此强烈的革命愿望,因此没有与农民阶级站在一起,积极参与这场暴动,使得在农民阶级里出现“党中最危险甚至使党无形的消灭的现象”^{[2]332-333},这是不利于工农联盟的,也导致了暴动失败。所以,他对鄂南的同志进行了批评,并部署了今后农民运动的策略,即“鄂南的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但农民对土地革命的热情仍然存在,省委应当派大批同志前往工作,恢复旧有的局面,完成暴动”^{[2]333}。这说明,我们党能够及时认识到错误并改正,主动选择相信农民阶级的暴动意愿,并进行积极引导。这样,党就能通过满足鄂南地区农民阶级的意愿和迫切需求,来发展鄂南地区的工农联盟,增强革命的群众力量。

(三) 推进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政权

罗亦农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进行了初步探索,他主张党的工作中心应该移至农村,应该武装工农,在农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政权。1927年8月底,他代中共中央起草《两湖暴动计划》,计划规定:“本党当前唯一重要责任,就是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推翻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政权,建立真正的平民革命政权,如此才能保障革命猛烈的继续进展。”^[9]《两湖暴动计划》得到中央批准后,他积极予以实施,亲赴重点地区鄂南部署工作,以期加快建立革命政权。他在1927年担任长江局书记后,对日后工作作出指示,明确提出,长江局的第二个大任务是“坚决的发展土地革命”^{[2]329},通过普遍地发展土地革命,取得两湖的政权。他还要求,在总策略之下,长江局所管辖的八省应立即执行具体的工作计划,即在适合推进土地革命的地区组织农民实施暴动,“动员大批党与团的同志前往指导,占据县城或割占数县以为各地土地革命发展之村镇”^{[2]365}。

(四) 进行游击战争,扩大革命割据地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余部进入井冈山地区,开辟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这是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转向农村的

起点。也是在这时,罗亦农被任命为长江局书记。在任期间,他高度重视工农武装暴动,提出要开展游击战争,逐步扩大根据地。他并不是盲目地进行暴动,而是强调要先进行游击战争。1927年10月,他在总结两湖暴动失败与广东失败经验时指出,现阶段的农民暴动的主要方式应当是发展游击战争,然后在相应时机下才开始总的暴动,最后实现扩大革命根据地的目的。因此,他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中提出,“此时湘鄂赣豫等省不宜有总的暴动,此时的策略应当是发展游击战争”^{[2]339},湘鄂赣豫等省的工作重心是准备将来的全省农民总暴动,最终形成“能割据某几县,成一独立区,如湘鄂赣交界处”^[10]的局面。

三、罗亦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与实践的当代启示

毛泽东认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11]罗亦农从多角度对农民问题进行了探索,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和中国革命作出了开创性贡献。虽然现阶段与他所处的时代相比,国情、党情、世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但他在农民问题上进行的诸多理论与实践探索,对于我们实施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一) 坚持党的领导,是乡村振兴的首要前提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2]罗亦农亦认为党的领导是解决好农民问题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他在解决农民问题的过程中,首先对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分别进行分析,并最终得出结论,那就是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实践证明,坚持党的领导是历史 and 人民必然与正确的历史选择,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要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全面领导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才能确保党在农村工作中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障^[13]。当然,在

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也需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须知打铁还需自身硬。从宏观来看,党组织建设需要高度重视并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克服自身的缺点和弊病,努力把我们党打造成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从微观来看,应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就这样要求到:“扎实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突出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抓乡促村,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成坚强的战斗堡垒。”^[14]由此可见基层党组织建设在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因此,一定要加强乡村的基础党组织建设,发挥其乡村领导核心作用,这样才能带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

(二) 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

无论是在进行工农联盟的革命时期,还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我们都需要通过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来完成每个时代赋予的不同使命。在罗亦农所处的革命年代,农民阶级还处在思想的转变期,大部分农民受教育程度并不高,且还接受着敌人的负面宣传。因此,这一时期的农民阶级并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也没有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目的和意义。要改变这一现象,就必须要对农民阶级进行政治宣传和教育。罗亦农明白这其中的利害,因此,他非常重视组织农村的政治宣传与教育,以此来提高农民阶级的整体素质以及革命热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增添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我国也需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振兴不是片面的、小范围的振兴,而是全面振兴,包括人才、产业、生态、文化、组织等各方面的振兴。这些美好振兴目标的实现都是以文化振兴作为基础的。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广大农民群众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因此,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首先,我们要重视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主力军,我们要通过不断加强农民教育政策的实施力度,将农村庞大的人口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提升人力资本的存量。同时,我们还要注重对新型职业农民进行现代人格培育,要通过不断的教育将受传统农耕文化消

极影响的农民改造成为有信仰、有担当、有本领、有情怀的新型职业农民。其次,我们要多渠道宣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分挖掘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消除落后文化的影响,并将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因素注入到农村文化产业的建设中。最后,要完善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为村民接受文化教育创造便利条件。

(三) 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把改善民生作为乡村振兴的根本

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5]这就启示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罗亦农十分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在面临如何加强工农联盟的现实问题时,他最先从农民阶级入手,去了解农民阶级最迫切的需求。在明白农民阶级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土地真正归自己所有之后,以罗亦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逐步进行土地革命,以期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满足农民阶级的最迫切需求,从而加强工农联盟,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要切实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同样需要从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通过解决人民群众所需所盼,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乡村振兴战略的美好感幸福感,从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

首先,要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做到乡村振兴是为了人民,乡村振兴的成果与人民共享。其次,从实际出发,了解现阶段农民的迫切需要。在制定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时,要注意深入基层,通过实地调查,了解农民的现实状况,把农民的意见和建议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到具体政策里。在实施政策过程中,要密切关注农民群众的反应,并以此来进行相关政策的调整,维护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再次,要最广泛最有效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去努力改善民生、助力乡村振兴。我们要明确地认识到,乡村振兴是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任务,要实现乡村振兴,仅仅靠一方面或几方面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调动全国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共同助力乡村振兴。最后,要加强新时代的工农联盟,建立城市帮扶农村、机关帮扶村组、干部帮扶村民机制,从政策、人才、技术、资金等方面构建新的工农

联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提供中坚力量。

总之,作为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罗亦农,在对农民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践的长期探索过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他的一系列关于农民问题的独特思考和认识。我们应当看到,罗亦农的这些认识与实践,对于新时代全面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亦不乏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6.7—1926.9):第3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45.
- [2] 罗亦农.罗亦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3] 牛晓迪.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资本主义早期工人生活的真实语境:论《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的谬误[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6(2):1.
- [4] 中国共产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116.
- [5] 王永贵,尤文梦.恩格斯工农联盟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实践创新:基于《法德农民问题》等著作的分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7):47.
- [6] 李良明.中国工运英烈传:罗亦农[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49.
- [7] 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湖南紧急会议决议案(1927年12月24日)[G]//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编(省委文件,1927年)甲种本:第5册.长沙:湖南省档案馆,1984:251.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572.
- [9]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本书协作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61.
- [10]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1927—1930)[G].北京:北京新华印刷厂,1985:24.
- [1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6-297.
- [1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0.
- [13] 王承哲.大历史观视野下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问题的百年实践及其启示[J].中州学刊,2022(1):5.
- [1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8-02-05(1).
-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责任编辑:黄声波

(上接第107页)

- [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47.
- [7] LEDER D. The Absent Body[M]. Chicago: Chicago UP, 1990: 172.
- [8] 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M].程相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72.
- [9] 威廉·詹姆斯.心理学原理[M].唐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3.
- [10] 残雪.探索肉体 and 灵魂的文学:访美讲演稿:下[J].名作欣赏,2017(2):11.
- [11] 李莉莉.心智的具身性与整体的人:解析现代哲学中的具身性思潮[J].浙江社会科学,2019,(1):98.
- [12] 梅洛·庞蒂.可见的与不可见的[M].罗国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317.
- [13] 易小斌.中国先民早期审美意识生成论[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6(2):9-16.
- [14] FRATTAROLA A. Developing an Ear for the Modernist Novel: Virginia Woolf, Dorothy Richardson and James Joyce[J].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2009, 33(1): 138.
- [15] IHDE D. Bodies in Technology[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xi.
- [16] 德勒兹,加塔利.千高原[M].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212.
- [17] POLANYI M. The Logic of Tacit Inference[M]. MARJORIE G. Knowing and Being: Essays. London: Routledge, 1969: 148.
- [18] GROOVER K K. Body and Soul: Virginia Woolf's To the Lighthouse[J]. Renascence: Essays on Values in Literature, 2004, 66(3): 217-229.

责任编辑:黄声波